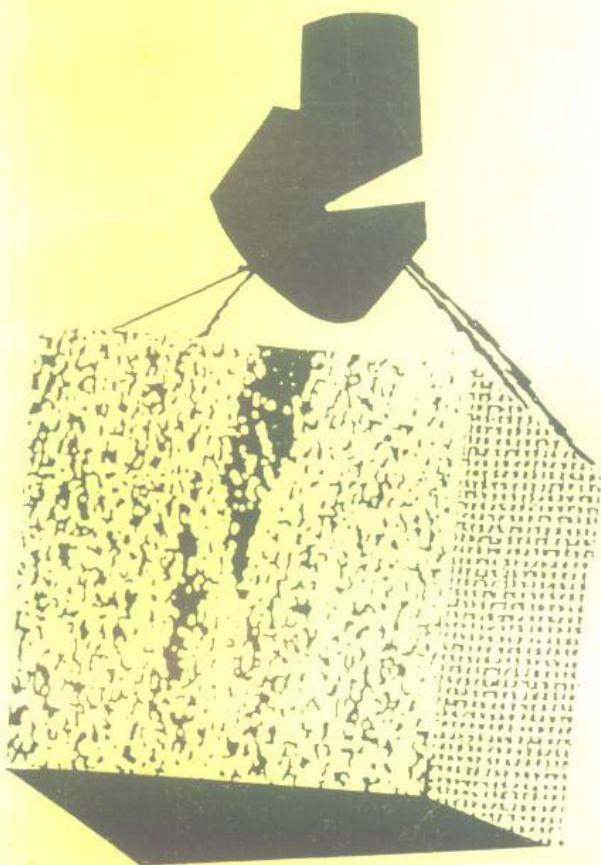




平等与效率



平等与效率

——重大的权衡

〔美〕阿瑟·奥肯 著
王忠民 黄清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成都

责任编辑：唐正宇
特约审稿：刘 东
封面设计：戴士和
插图：王 静
装 帧：盛寄萍



平等与效率

(美)阿瑟·奥肯 著
王忠民 黄 清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mm 1/32 印张 6 插页 5 字数90千

1988年5月第一版 1988年5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0-00336-6/C·77

印数：1—32,000册

定价：1.30元

编者献辞

《走向未来》丛书和读者见面了。她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60789/9 16

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解了科学的价值，并逐步深化了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今天，我们听从祖国的召唤，热情地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

《走向未来》丛书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丛书》是个新的园地，她将自始至终贯彻严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5页。

肃认真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走向未来》丛书，从她一开始就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关怀，受到学术界前辈的热情支持。

约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曾经这样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丛书》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关心她、批评她、帮助她。

让她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北京

梦想与现实的 交替与权衡

——中译本代序

刘 东

“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必须被控制在恰当
的范围内。”

这是美国已故经济学家亚瑟·奥肯（Arthur
M. Okun, 1928—1980年）在由布鲁金斯学会出
版的《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一书中的点睛
之笔。

奥肯在经济理论上倾向于凯恩斯学派，长期致
力于宏观经济理论与经济预测的研究。也许是由于
他曾一度出任过约翰逊时代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
主席，担当过美国政府的高层经济决策者的缘故，
他不得不着力研究这种决策中的一些两难问题，以

期摆正政策经济行为与市场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经济学家所注目的焦点，就是各种交错关系中的权衡：“‘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应当成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原则。定量的劳动和资本，如果被用来生产了更多的此种产品，就不能再生产出更多的其他产品。现期消费的增加，就意味着未来储蓄的减少。工作时间的延长，就必然减少闲暇时间。治理通货膨胀就会带来生产和就业的牺牲”。他坦率地承认，对于最后一个两难问题的权衡，曾经耗费了自己差不多毕生的精力，但始终也未能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办法。

但是，在我们所要评述的这本书里，奥肯却从上述种种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中暂时脱身出来，希望能集中精力来对付另外一种更加令人进退维谷的，被他认为是最为重大的两难问题——平等与效率。正如布鲁金斯学会主席克米特·戈登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照他看来更为纠缠不清，影响更加广泛，同时也更加利害攸关的权衡关系。”因为在这种权衡关系中，奥肯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政策的制订和分析，而是美国的国家体制以及它所存在的问题。也许，正是由于思考的递进，迫使作者不得不把眼界从经济决策拓宽到这种决策之所以作出的整个社会背景。

奥肯认为，在平等与效率中间之所以出现两难，是由于美国那种双重交错的社会结构和价值标准。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认可每个人的存在价值，保障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政治权利上的平等；美国的全体公民，都被承认为同一俱乐部的平等成员，都有权进入国家纪念馆，有权得到消防队的紧急救援。但另一方面，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却又宣布：“不工作，便挨饿。”“不成功，就受穷。”这种制度在力图保持人们平等社会地位的同时，又刺激人们从经济上高人一等，它奖惩无欺，以致于成功者的爱兽竟比失败者的子女更受优待。“这就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双重价值标准：一方面，追求和信奉平等的政治与社会系统；另一方面，又同时在经济福利上造成着不断加大的差距”。

当然，一个社会在同时追求公民权利平等和经济效率提高这两方面的时候，并不总是碰到“或此或彼”的关系。它们有的时候是“两败俱伤”或者“相反相成”的。比如，假设对富者所课的税率重到足以破坏其投资愿望，就会使贫者的就业机会锐减，从而使社会在平等和效率两方面同时落空。再比如说，那些既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又有助于非熟练工人增加收入的技术，则可以使社会在平等与

效率两方面齐头并进。但是，却也有许多场合，平等和效率是不可兼得的。一方面，在市场上飞黄腾达的人，使用货币来猎取额外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本应为民众所公平享有；而在市场上栽了跟头的人，便在权利和机会方面于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了剥夺和侵害，而这种剥夺和侵害是与民主价值观念相悖的。在另一方面，那些用于减轻经济不平等之范围和程度的经济政策，却又有损于生产者的积极性，人为地干预了市场的结果，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在市场竞争的前提下所获得的经济效率。

于是，这种平等与效率之间的交错与矛盾，就导致了一种既平等又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使人们陷入价值观上的二律背反。反平均主义的学者们强烈反对政府干预市场，他们把“吃大锅饭”认为是怪诞甚至发疯。这种对效率的片面追求，显然忘记了《独立宣言》所宣布的人权平等，否定了《人权法案》。而另一方面，站在相反立场上的作家们，又把拥有大量财富和巨额收入视为十恶不赦，把“利润”、“富有”看成是一些肮脏的字眼。这种对平等的片面强调，完全忽视了市场对于整个社会所带来的积极作用，看不到它是一种开发和促进生产力、鼓励开拓和创新精神的有效杠杆。

奥肯不同意这两种极端的看法。他把权利上的平等与收入上的不平等，看作一种困难的折衷，并且认为正是这两者揉在一起，才在民主政治原则和资本主义经济原则之间激发出一种张力。一方面，尽管权利是反效率的，“它排斥价格，所以放弃了对权利的节俭；拒绝选择，于是排除了优劣比较；鄙视刺激，就压制了社会创造的动力；弃绝交换，因而将买卖双方潜在的利益化为乌有。但是，从自由、政治上的多元和人道主义这三个方面来看，它又是具有合理性的。奥肯写道：“假如权利交易蒙准，毫不费力就能设想出更多的权利买卖”。……那种不得同时与一个以上的人婚配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可以通过给每人一张可以出售的结婚票证，从而把一夫一妻制改变成允许自愿交换的关系。既然法律诉讼费是昂贵的，那么社会应该向任何出卖权利的被告提供部分费用。征兵义务中的交易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事实上过去早就有。甚至，连服从法律的义务也能营利”。奥肯通过这种归谬一样的设想，并且通过对罗尔斯《正义论》的大量引证，说明平等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价值观念之一。这种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与人的尊严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它们不应该以货币来买卖。但在另一方面，尽管效率是反平等的，比如，通过市

场交易，货币可以买到带有倾向性的法律服务，可以买到影响被选举官员的力量。然而，这种市场经济，却“反映了一种企图以赏罚来鼓励和刺激人们去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它创造出了有效率的经济。”在美国，“尽管市场经济从来也未达到过理想的完全竞争，但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中，市场都已被证明是个无可辩驳的高效生产组织者。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长期记录，证实了市场模式的许多特征。”

正因为这样，鱼和熊掌既不可兼得，又不可或缺。而摆在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面前的任务，就只能是在权衡。

社会在许多方面都面临着抉择：或者以损失一定的效率为代价而获得更多的平等，或者以放弃一定的东西，总是要付出代价，使人们在某种权利和价值观念上受到损害。因此，人们所能够做到的，就只有权衡利弊，两害相比择其轻，两利相较选其重。正如奥肯所写道的：“如果平等与效率受到同等对待，分不出孰高孰低，在两者发生冲突时，就必须寻求调和。在有些时候，为了效率就要放弃一些平等；另一些时候，为了平等，必须牺牲一些效率。但无论哪一方作出牺牲，必得以另一方的增益为条件，或者是为了获得别的有价值的社会目

的。”

当然，权衡在这里并不意味着一个社会只是在和稀泥。奥肯将平等与效率这两种因素的此消彼长的冲突，看成整个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张力。在这种权衡中，社会并不是在维持一个矛盾重重的现状，而是可以长足地发展。因此，奥肯在本书最后一章里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在有效率的 经济 中促进平等”。他认为，在生产领域里，应以效率为先，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增加社会财富；而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多，则又是达到较为平等的分配的前提。而在生产领域之外，也就是在再分配领域里，则应把平等原则贯彻进去，通过政府的功能去消除不均。这就是累进税，向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就业计划等等的作用。很明显，这有助于社会达到除政治权利之外的相对的平等。

奥肯的这部著作是针对美国社会而写的。在那个社会里，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人们法定的平等政治权利的侵害是广泛而且严重的。这种现象经常被我们批判为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而奥肯本人也承认这种既平等又不平等的现象“甚至虚假伪善”。正因为这样，他才写下了我们在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句话，希望能对市场资本主义进行限制。

但与此同时，他也在本书第三章里对现行的混合型资本主义与成熟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比较，并且据此对社会主义以巨大的效率牺牲所换取的平等表示了极大的怀疑。他写道：“过度贬低竞争就意味着放弃对个人的激励因素，反过来就会大量牺牲效率，或者找到一种新的激励因素作替代。或许人们在“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类博爱大麾下，为大道工作、创造。但光凭这种精神能不能激发起公共道德，培养出各类人材，而不只是德性高尚的圣徒，这还值得怀疑。”在这里，他的潜台词显然是：“平等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也必须被控制在恰当的范围。”

也许，奥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了解还只停留在书本的原则上。但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苛求他。很可能，平等在任何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都是一场梦，尽管这种梦往往比起现实来显得更加真实，更重要，更贴近人类的本真存在。但无论如何，对于急需在生产领域内大力开放市场竞争，以便扭转长期忽视效率的现行体制的我们来说，认识到人类的真正充实的生活是交替于梦想与现实之间，认识到一个社会的生命力是交替于平等与效率之间，总是大有裨益的。

序 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美国的社会结构是双层交错的。它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向人们提供广泛享有的各种权利，承认所有公民的平等。但是，它的经济体制却建立在市场机制之上，而由市场决定的收入则在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物质福利上造成了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被作为奖惩的工具，去刺激人们更有效地利用资源，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

权利上的平等和收入上的不平等揉在一起，在民主政治原则和资本主义经济原则之间激发了一种张力。在市场上飞黄腾达的人使用货币猎取额外权利，而这些权利本应为民众公平享有。一些人在市场上捷足先登，造成机会上的不均等；另一些人则

在市场上栽了跟头，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剥夺，而这种剥夺是与人类尊严和相互尊重的民主价值观念相悖的。但是，那些用于减轻经济不平等之范围和程度的经济政策却又有损于生产者的积极性、影响经济效率。社会在许多方面都面临着抉择：或者以损失一定的效率为代价而获得更多的平等；或者以放弃一定的平等为前提而谋得更高的效率。用经济学的专业用语来说，对平等与效率的权衡（trade off），便由此产生了。

这种权衡关系，就是阿瑟·奥肯这本书的论题。作者在大部分学术生涯中，都倾全力去权衡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关系中那些许多尚未得到答案的问题。无论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研究生时，在耶鲁大学任教时，在担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继而担任其主席期间，还是在1969年后成为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以来，他都锲而不舍。但在本书中，作者却将上述主题暂搁一旁，而将注意力转向一种在他看来是更为纠缠不清、影响更为广泛、同时也更利害悠关的权衡关系——平等与效率。

本书的基调和特点（就像其主题一样）不同于作者的其它著作和布鲁金斯学会所发表的大多数论著。作为一本个人专著，它反映了作者本人的价值观、判断和研究经历。准此，作者就将其注意力集